

《宗教与世界》丛书

政治期望

POLITICAL EXPECTATION

保罗·蒂里希著

PAUL TILICH



四川人民出版社

政 治 期 望

保 罗 · 蒂 里 希 著

徐 钧 尧 译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1989年·成都

Political Expectation

Paul Tillich

根据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7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汪 泳

封面设计：杨守年

陈万福

技术设计：凌志云

• 《宗教与世界》丛书 •

政 治 期 望

保罗·蒂里希 著 徐钧尧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134千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513-X/B·37 印数：1-2,300

定价：3.25 元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序

要在横跨哲学与神学两大领域的20世纪思想家选出几个地位最高的人物，而不提到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 1886—1965）的名字，那就属于无知。蒂里希在哲学思想的深度上，不比海德格和萨特逊色，而在神学思想的影响上，堪与马里坦和巴特匹敌，这样的人物，在20世纪委实是不多的。

保罗·蒂里希1886年生于普鲁士，曾在马堡大学、德累斯顿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哲学和神学。他作为宗教社会主义的理论领袖，坦率而公开地批判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同纳粹党发生了冲突，因而被迫放弃教席，离开德国，移居美国。在美国，他先后担任纽约协和神学院、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直至1965年逝世。他的著述极其宏富，举其最重要者，有《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共3卷5部，《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爱、力量与正义》（Love, Power and Justice），《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新教时代》（The Protestant

Era), 《圣经的宗教与对终极实在的探求》(Biblical Religion and the Search for Ultimate Reality), 《道德与超越》(Morality and Beyond), 《基督教与世界诸宗教的相遇》(Christianity and the Encounter of the World Religions)等等。

如果把海德格比作20世纪的亚里士多德,那么蒂里希就是当代的托马斯·阿奎那。这种类比当然很不恰当,但是,正如阿奎那神学的哲学基础接近于亚里士多德哲学,蒂里希神学的哲学基础也同海德格哲学十分接近,虽然他的思想同海德格的思想并不是没有分歧的。正因为如此,蒂里希才以存在主义神学家而闻名于世。然而,只要仔细阅读他的著作,甚至只要仔细阅读手里这一本《政治期望》,我们就会发现,像他这一类的大思想家,是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标签来加以概括的。要为这么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贴标签,恐怕得贴上千万张,这么多标签除了所填名称有别,恐怕还得有颜色深浅、尺寸大小等方面的区别才行(因为他的思想具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论域,不同的维度,等等)。不过,这样一来,标签就不再成其为标签,而成为花衣裳了。而我们大家知道,花衣裳往往造成错觉,掩盖了着衣者的真相。要了解这个广泛融汇了历史上种种思想(从宗教、哲学思想直到社会、伦理思想),而又大大影响了今日世界上各种思想(也是从宗教、哲学思想直到社会、伦理思想)的庞大思想体系,唯有剥掉它的外衣,抛掉种种标签,通过直接阅读其代表著作才能洞悉其真相。而这项工作,恰如当代著名的美国神学家H.理查德·尼布尔在评论蒂里希的代表作《系统神学》时所言的那

样：“……阅读《系统神学》，可以成为一次作出发现的伟大航行，这次航行所进入的，是对于在上帝的奥秘面前的人类生活的一种既丰富又深刻、既广泛又详尽的观察和理解。”

恰如托马斯·阿奎那不仅以其《神学大全》而成为中古时代西方宗教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那样，保罗·蒂里希也不仅以其《系统神学》提供了“在我们这个纷扰的世纪的种种希望和恐惧之中所出现的基督教和宗教思想的主要成果”（当代神学家麦奎利语），提出了“当代所产生的无疑是最为丰富多采、最富有启发性和最富于挑战性的哲学神学”（当代宗教哲学家兰德爾语），而且在现代的社会政治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而深邃的观点。读者手里的这本小书，就是蒂里希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性汇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宗教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的关系。

这本小书包括了蒂里希从本世纪20年代直到1965年他逝世前夕发表的8篇演讲和论文。这些著作所涉及的背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动荡的德国局势，直到处于核武器威胁之下的人类处境，时间跨度极大；所包含的内容，从基督教的政治主张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直到一般的国家理论以及爱、力量与正义的关系，论述范围极广。这本小书把宗教、伦理与社会、政治两方面的理论，包括从宗教角度来考察的阶级与国家、民主与专制、社会与个人、现在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以至经济制度与心理人格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历史和现实的评价、抽象和具体的分析，宗教和世俗的学说，统统融为一体。其中有许多东西，我们可能赞成（例如对资本主义的深刻

批判和对无产阶级状况的富于同情的分析)；有许多东西，我们可能反对(例如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某些看法)；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重视(例如第4篇文章，可视为一篇“宗教社会主义宣言”)；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深思(例如对“乌托邦”的深刻评价)。

蒂里希不但像20世纪另一位数一数二的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一样，对当时的工人阶级状况十分关切，而且他在本书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蒂里希作为宗教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非常注重具体的历史环境，注重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批判；同时，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都是从活生生的人、从具体的人生、从生命的意义和人的存在结构的深度来进行的。这一方面表现出，他对个人的重视甚于对经济结构的重视，他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尽管他曾被称为“红色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同海德格、巴特和布尔特曼等人的存在主义把社会政治和历史环境化为个人生存问题的倾向，又有很大的区别。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对基督教的想法同上述几位哲学和神学巨匠有所不同。他认为，“基督教本身具有以自己的面貌塑造人类生活的力量和意愿”。总之，蒂里希是以哲学本体论、基督教神学和伦理学为基础，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予特别注意。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蒂里希的名字已逐渐熟悉，但是，对这位像康德或者阿奎那一样值得认真研究的人物，不必说研究之落后，就是一般的了解之欠缺，都到了惊人的地步。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够推动我国译介和研究蒂里希的思想这方面的

工作，能够为学界研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份重要的资料。

何光沪

1988年2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导言·····	詹姆斯·卢瑟·亚当斯	1
基督教与现代社会·····		20
作为批判和创造原则的新教·····		30
宗教社会主义·····		64
宗教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85
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		121
作为期望和要求的国家·····		130
幻影和实质：一种力量理论·····		151
乌托邦的政治意义·····		162
索引·····		230

导 言

(詹姆斯·卢瑟·亚当斯)

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在40多年以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用德文写成的。然而它们针对了我们当代的状况，因为它们所谈论的基本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仍然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议事日程之中。当保罗·蒂里希根据一个新教徒的观点论述这些问题时，他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见解，旨在说明“资本主义历史晚期阶段”的结构性失调，并且力图揭示对前景抱有信心、即怀有“希望”和“期望”的依据。然而应当注意，关于后一问题——即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 今天称为“希望动力”的问题——的专题论文，是在20年之前写成的。

本书之具有现实意义，还有第二个原因。魏玛时期的神学家被认为是开创了新教思想史的一个新时期。今天这些著述的地位和影响正在被人们重新估价。本书反映了这一早期阶段的一个侧面，而在当时和今天，人们对这个侧面的关注，却要少于对较狭窄的神学著述的关注。

魏玛共和国时期是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四年战争之后社会严重动乱的时期。在战争年代，蒂里希曾在德国军队中担任随军牧师。在1915年的香槟战役中，整个这一时期的经历仿佛像一场预演，成为他注视的一个醒目焦点。他写道：“它向我揭示了人类生存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深渊。”在他看来，成为问题的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体系，而这个深渊正是一个社会体系的崩溃。正是从这样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旷日持久的“危急处境（emergency situation）”，才锻造出后来的这些论文。简略叙述一下魏玛时代末期举行的一次通宵晚会，将会使我们对当时的形势有一个生动的了解。

1931年夏天，离纳粹上台已不到两年，保罗·蒂里希与其夫人汉娜·蒂里希在北海锡尔特岛上的避暑胜地坎姆彭度假。一天晚上，一群朋友在赛德尔·洛温费尔德夫妇处作客。宾主都来自柏林，当时德国的事态发展非常迅速，大家谈论时事，直到黎明，凌晨4点左右，太阳冉冉升起，他们便走到屋外观看日出，俯瞰着海滩和大海。大家都站在一起，汉娜·蒂里希背诵了歌德的一首描写海上的一条小船的诗。大家都静了下来，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突然，保罗·蒂里希打破了沉静，说道：“你们大家全都能活到那一天，看到那时羊群将放牧在波茨坦广场。”这一预言完全成了后来预兆的前奏……若干年之后，居住在纽约市的蒂里希惊奇地读到来自德国的一条消息，表明这个预言竟已成为事实。羊群正放牧在波茨坦广场上！不仅如此，波茨坦广场还变成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

发出这一预言的是这么一个人，10多年来他一直同由宗教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凯瑟斯^①社团的伙伴们一起，致力于反对当

时正在带来黑暗和毁灭的势力的斗争。魏玛共和国及其改革努力的失败，当时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隐藏在这一失败背后的各种因素多少是人们所熟悉的：从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中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意识里滋生起来的紧张局势；大量的城市无产者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工业家们对待民主思想和议会制社会主义的顽固态度；各教会对统治集团的支持和工人与各教会的疏远；巨大的工业生产力和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分离；日益加剧的失业状况；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家主义者之间的争权夺利；以及在共和国的体制之下，特别是在世界性大萧条面前，任何彻底改革的集团都不可能获得政权的实际状况。

毫不奇怪，甚至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就以其对于衰落的诊断而受到人们广泛的注意。同样，毫不奇怪，凯瑟斯社团的成员和其他许多人都相信，一个西方文明的旧时代行将结束。

在这一处境之中，政治上曾相当活跃、并且正在创立一种文化神学的蒂里希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神学家的任务？^①他深深懂得，神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发表甜蜜的宗教的胡言乱语，而是要把每一种观点，包括“宗教的”观点都置于彻底的审判之下，让每一种观点都承担起责任。他把这种冲击说成是宗教处

^①这是希腊文Kairos的音译。该词出自《新约圣经》，大意为“完成的时刻”或“实现的时刻”。在后文中，蒂里希多次对这个词作了阐释。——译者

^②参见《论文化神学的观念》（On the Idea of a Theology of Culture, 1919），载詹姆斯·L. 亚当斯编：《宗教是什么》（What is religion?），纽约，哈珀与罗公司，1939年。

境的“垂直维 (the vertical dimension)”。同时，他还断言，宗教处境并不限于表现为教会、信经和礼仪的“宗教”领域，而应包括“整个当代世界，因为没有任何事物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宗教处境的表现^①”。他把这一方面称作“水平维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在他的文化神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他所发明的新语汇，他想通过这些语汇以象征的力量来揭示这种处境及其各种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这套语汇是在他所谓“危急处境”中设计出来的。^②

如果我们把蒂里希对这种危急处境所作反应的范围与他三位同时代人作一比较，那我们就能清楚地把握住蒂里希的观点。这三个人是马丁·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鲁道夫·布尔特曼 (Rudolf Bultmann) 和卡尔·巴特 (Karl Barth)。他们三位都很有影响，与蒂里希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回顾他们四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相互关系，看一看蒂里希是如何看待另外三人的，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从历史背景上把握蒂里希的宗教社会主义。这四个人经常被说成是存在主义者。但在这里，我们无法讨论用这一名称称呼这四个人物是否正确。

①《宗教的处境》(The Religious Situation, 1925), H. 理查德·尼布尔 (H. Richard Niebuhr) 英译, 纽约, 亨利·霍尔特公司, 1932年。

②这里我们不算列举或定义独特的蒂里希风格的语汇。参见笔者《保罗·蒂里希的文化、科学和宗教哲学》(Paul Tillich's Philosophy of Culture, Science, and Religion), 哈珀与罗公司, 1955年, 肖肯公司平装本, 1970年; 另见《蒂里希关于新教时代的概念》(“Tillich's Concept of the Protestant Era”), 载保罗·蒂里希:《新教时代》(The Protestant Era), 詹姆斯·L. 亚当斯编译,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48年。我们在此只想联系这些词汇最初出现的背景来解释本书中的一些基本论题, 并且引述作者论述这些论题的其他著作。

在蒂里希的理论中,存在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号召人们返回到直接体验到的实在,它有力量揭示人类生存(或“人”)的可疑性质,并看到它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我们的时代表现得特别明显),看到它的分崩离析、它的深渊、它的无意义和绝望的意识。

他指出了两条路线的存在主义。第一条路线开始于克尔凯郭尔,发展到海德格和萨特,其分支(我们可以补充说)还包括布尔特曼和(在有限的程度上的)巴特。蒂里希承认他自己与这条路线有密切联系,虽然他还在这条路线上加上了其先驱者之一谢林的名字——在此我们不要忘了,正是谢林创造了“存在哲学(Existentialphilosophie)”这一名词。但是蒂里希又认为自己与第二条路线即先知的路线(prophetic line)也有着联系。这条路线来源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他们以前还来自旧约的先知。在这里,我们要引用本书未收录的一篇重要文章中一段精彩的议论。在这段话中,蒂里希表明,第二条路线的存在主义和第一条路线一样,既包括公开反宗教的人物,又包括信仰宗教的人物。

在19世纪,先知的精神曾在两个场合表现出来,而每一次都以同基督教的冲突为旗帜。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在马克思那里,我们通过言论和行动发现了老的犹太教先知的精神;而在尼采那里,则可以发现路德的精神。虽然这场战斗,一方面是为了公正,另一方面是为了创造性的生活,它采取了反对上帝的形式,但它抨击的是被一种陈见即资产阶级社会的陈见所束缚的那么一个上